



李良玉教授与其博士生

文丛

Liliangyu Jiaoshou Yu Qi Boshisheng Wencong

思想、制度与社会转轨

——中国当代史新论

Sixiang Zhidu Yu Shehui Zhuangui
Zhongguo Dangdaishi Xinlun

李良玉 主编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李良玉教授与其博士生

文丛

Liliangyu Jiaoshou Yu Qi Boshisheng Wencong

思想、制度与社会转轨

Sixiang Zhidu Yu Shehui Zhuangui

——中国当代史新论

Zhongguo Dangdaishi Xinlun

李良玉 主编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思想、制度与社会转轨:中国当代史新论/李良玉主编. —合肥: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07.3

(李良玉教授与其博士生文丛)

ISBN 978-7-81093-554-8

I. 思... II. 李... III. 中国—现代史—文集 IV. K270.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28376 号

思想、制度与社会转轨

——中国当代史新论

李良玉 主编

责任编辑 朱移山 章建

出版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地址 合肥市屯溪路 193 号
邮编 230009
电话 总编室:0551-2903038
发行部:0551-2903198
网址 www.hfutpress.com.cn
E-mail press@hfutpress.com.cn

版次 2007 年 3 月第 1 版
印次 200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10 × 1000 1/16
印张 17.25
字数 328 千字
发行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 合肥现代印务有限公司

ISBN 978-7-81093-554-8

定价:28.00 元

如果有影响阅读的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总 序

“李良玉教授及其博士生学术文丛”原由知识产权出版社出版。从现在起，这套文集将由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陆续出版。为了既体现丛书的连续性，又显示新一家出版社的气象，丛书改名为“李良玉教授与其博士生文丛”。2005年8月至2006年8月，在知识产权出版社领导的大力支持下，特别是在副总编辑王润阁先生和编辑牛洁颖女士的直接主持下，共有《李良玉教授历史研究与教育文选》和我的5位学生的博士论文出版，还有一位学生的博士论文目前已经修改完毕，即将交付审阅。我衷心感谢所有关心和参与这套丛书的朋友们的远见卓识和辛勤劳动，也特别珍惜和他们相处过程中所获得的真诚。记得我在给牛洁颖的一封电子邮件中说过：“人文社会科学的东西，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而已。我很欢迎和你推心置腹地讨论问题，目标是一致的，就是把书出好；立场是一致的，就是以诚相见；我想效果自然也是可以预见的，就是互相更加信任，友谊愈笃。”这段文字代表了我们的共识。

1999年，南京大学通过有关程序确认我具备博士生导师资格，次年一起我开始招收学生。假如按今天官本位条件下博导的实际社会地位、声誉及其所承担的职责等多项指标来衡量，成为博士生导师或许并非幸事。然而，我仍然感谢学校领导、研究生院和所有参加评审工作的校内校外专家，他们给了我一份可能，如同我在第一届学生答辩的时候所说：“使我有机会获得培养青年、提携才俊的创造性工作的快乐”。它来源于教育的诚实、神奇和自我满足。

把我指导的学生的论文结集出版博士论文丛书，是我招收博士生伊始就定下来的努力方向，也是一开始就向同学们提出来的目标。这是一个艰难的目标。现在，这套丛书已经拥有13种著作，预计今后一两年内将达到20多种的规模。假如有人问我，丛书的价值何在？我依然回答：任何著作一经出版，对它的评判权从来就不属于作者。只有读者和时间的检验，才能最终决定其命运。

除了我的书以外，这套丛书的著作，多是我的学生的博士论文。读他们的书，能读到一些锐气，自然也会有一些幼稚。同学们努力学习的风范是值

得夸奖的,从这个角度上说,丛书为了解当前博士生教育提供了一例个案,不论这一个案有没有价值。

回顾招收博士生以来的教书生活,我从内心深处感激我的学生。无论来自何方、年龄大小、从事过什么工作,他们为了读书求知的共同目标走到一起来了。我们坦诚相处,教学相长,虽然也会有艰难或者隔阂,但毕竟能够获得一些理解与成长的经验。我始终认为,生活的本质在于真实。基于这样的理念,我曾对同学说过,追求真实而不追求虚伪,追求幸福而不追求痛苦,追求理解而不追求怨恨。博士生的学习生活是一种知识、道德和能力的全面提高过程,它既是学生的提高过程,也是老师的提高过程。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都是由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所积累起来的进步。

在同学们的身上,我们能够感受到新时代学术的朝气。尽管他们各自人生阅历、知识背景、生活目标不尽相同,但是读书生活却给了他们以同样的学术传统、学术理念、学术规范与方法的熏陶。在这里,我个人的能量是有限的。不过,我们拥有传统人文的深厚资源、外来学术的精彩信息和百年老校的丰富积淀。它们浩如大海,蔚为壮观。也许,现代与传统的衔接,师道与学统的交汇,个人与时代的融合,才是他们不断自我觉悟,自我更新,自我发展的内在精神动力。

博士论文,是博士生学习的主要成果,也是当代学术进步的重要标志之一。引导同学完成博士论文的过程,是师生之间知识交流、思想交流、情感交流的完整过程。对老师来说,同学的敏锐、勤奋与活力,是那么的宝贵;对于同学来说,每一类学术题材的发现,每一种学术思路的开拓,每一个细节问题的解决,都会带来学问启蒙和心灵震撼的作用,甚至包括对人生意义的新认识。近20多年来,有相当多的博士论文开辟了各自学术领域的新境界。它告诉我们,博士论文质量的根本标志,是按照学术规范研究解决问题所达到的水平,或者说,是解决问题的难度及其所包含的开拓性成就。有鉴于此,我们才应该把博士论文看作是一种文化创造,一种当下社会和时代应当能够留下来的精神产品。要求所有博士论文都达到这样的水平也许很难,但是,提出这样的要求是必要的,鼓励每一位博士生向这样的目标努力前进也是有意义的。

是为序。

李良玉

2007年1月23日于南京大学港龙园



目 录

总 序	李良玉(1)
-----------	--------

进一步重视和推动对中国当代史的研究	李良玉(1)
-------------------------	--------

建国初期江苏的工商业调整	陈肖静(9)
--------------------	--------

江苏“三反”、“五反”运动研究	任玲玲(19)
-----------------------	---------

苏南土改中的划分阶级成分和反封建问题	白 纯(30)
--------------------------	---------

苏南土改中的农村公地问题	钟 震(39)
--------------------	---------

苏南土地改革中的工商业问题	陈肖静(51)
---------------------	---------

苏南土改中的知识分子问题	谭志云(63)
--------------------	---------

苏南土地改革中的富农问题	莫宏伟(71)
--------------------	---------

饶漱石与华东新区土地改革	莫宏伟(81)
--------------------	---------

美好的远景和过高的预期

——农业合作化高潮形成的原因之一	叶扬兵(94)
------------------------	---------

1956~1957年合作化高潮后的农民退社风潮	叶扬兵(104)
-------------------------------	----------

江苏省南通地区“算账”事件研究

——透析平息退社风潮中的打击单干户现象	叶扬兵(116)
---------------------------	----------

“大跃进”时期的河南农村公共食堂	贾艳敏(127)
------------------------	----------

人民公社分配制度的形成

——以江苏为例	周 彪(136)
---------------	----------

“宝应事件”研究	周 彪(147)
----------------	----------

论“一五”时期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 叶扬兵(158)

新中国劳动制度的形成 赵毓坤(168)

论中苏同盟关系的破裂 冯春龙(178)

论 1954 年宪法 李 宁(186)

周恩来文化思想研究

——1949 ~ 1962 李 宁(195)

《新人口论》批判及其历史教训 汤兆云(205)

1972 ~ 1976 年间中国高等教育的过渡性分析 李 刚(214)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苏南乡镇企业与乡镇消防队的建设 白 纯(224)

我国现行人口政策的形成与稳定 汤兆云(233)

50 年来中国天主教研究的回顾与前瞻 荆世杰(242)

苏州西园寺佛教文化研究 李尚全(258)

后 记 李良玉(271)



进一步重视和推动对中国当代史的研究

李良玉

1949年以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在历史学学科的意义，属于断代史。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国家，它拥有无限的生机和活力。因此，1949年以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又不是完整意义上的断代史，我倾向于把它作为当代史来处理。

粉碎“四人帮”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的人文社会科学获得了空前的发展，当代史研究日趋繁荣。20多年来当代史研究的巨大成就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整理出版了大批当代史料。这些史料有几种类型。一是综合性文献和档案史料。比如，1996年团结出版社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全鉴》（全6卷），收录了1949至1995年间的大量史料。比如，1992至1997年出版的《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全书20册约744万字）、1982年出版的《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件选编》（上下册计79万字）、1986至1988年出版的《十二大以来重要文件选编》（上中下册计88.5万字）、1991至1993年出版的《十三大以来重要文件选编》（上中下册计106.3万字）、1996至1999年出版的《十四大以来重要文件选编》（上中下册计155万字）、2000至2001年出版的《十五大以来重要文件选编》（上中册计104万字）等。二是个人文集类资料。比如，1977年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5卷、1987至1996年出版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全书11册约465万字），80年代以来先后出版的《毛泽东文集》（全8卷，6至8卷为当代）、《刘少奇选集》（上下册，下册为当代）、《刘少奇论新中国经济建设》、《周恩来选集》（上下册，下册为当代）、《周恩来经济文选》、《周恩来文化文选》、《朱德选集》、《邓小平文选》（3册）、《陈云文选》、《张闻天选集》、《薄一波文选》、《叶剑英选集》、《万里文选》、《邓子恢文集》、《陆定一文集》、《胡乔木文集》、《杨献珍文集》、《储安平文集》（上下册）、《顾准文集》等。三是专题资料。比如，原国家农业委员会办公厅编辑、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出版的《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上下册计191万字），中国社科院哲学研究所资料室编辑的《三十年来阶级和阶级斗争论文选集》（5册），财政部办公室组织编辑、中国

财政经济出版社1982年起分类分辑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史料》，中国社科院与中央档案馆编辑、中国物价出版社等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选编》等。四是回忆录。比如，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下卷），《彭德怀自述》，《黄克诚自述》，李维汉《回忆与研究》，李锐《庐山会议实录》、《我为刘少奇当秘书》，张佐良《周恩来的最后十年》，汪东兴《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于光远《我亲历的那次历史转折》，吴冷西《忆毛主席》，吴庆彤《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薛暮桥回忆录》，《七十年征程——江渭清回忆录》，童小鹏《风雨四十年》、《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缅怀毛泽东》（上下册）、《周恩来和他的秘书们》、《缅怀彭真》、《点点记忆》，张宁《自己写自己》、《林彪反革命集团覆灭纪实》、《历史在这里沉思》（三卷）等。

第二，取得了非常可观的研究成果。据王秀美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论著目录索引》一书录自国内800余种报纸、学报、期刊、丛刊、通讯、研究资料的统计，1949年10月至1992年底已发表的文章、论文、著作和资料就有20000余种，其中著作和资料性的小册子3300多种。当代史研究真正繁荣起来是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文革”的结束，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结束了20世纪50年代后期以后长期实行的“左”倾教条主义的统治，兴起了以真理标准讨论为标志的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开始了以《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为主要成果的反思和总结建国以来历史经验的工作。从80年代初开始，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以及各级地方党史办公室、地方志办公室相继成立。1978年以来《党史研究资料》、《党史研究》、《党史资料通讯》、《文献和研究》等刊物先后出版。1982年，中共中央批准《当代中国》丛书立项，1990年创办了以专门研究当代史为职责的当代中国研究所和《当代中国史研究》杂志。1986年9月，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中国文革十年史》，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关注。1989年，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四卷本当代史（林蕴晖、范守信、张弓：《凯歌行进的时期》，丛进：《曲折发展的岁月》，王年一：《大动荡的年代》，王洪模《改革开放的历程》），标志着学术界开始努力把当代史纳入学术研究的范畴。据1995年编就、次年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社会主义时期党史研究综述》一书分析，对1949年以后的党史研究已经在45个专题上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另据介绍，截至1999年，《当代中国》丛书150卷（208册）已经出齐。前74卷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后76卷由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合计9500多万字，30100多幅图片，署名人员8000多人。1999年10月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是迄今为止最权威的当代经济史著作。1996年，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序卷），现已完成1至4卷。据悉，《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简



史》丛书、《当代中国人物传记》丛书、《百县调查》、《百家大中型企业调查》、《百家乡镇企业调查》、《百强村调查》等书也正在进行之中。人物研究方面有《周恩来年谱》(1949~1976)、《周恩来大事本末》、《刘少奇年谱》、《刘少奇一生》、《陈毅传》、《徐向前传》、《罗荣桓传》、《刘伯承传》、《彭德怀传》、《叶剑英传》、《张春桥传》、《王洪文传》、《姚文元传》、《江青传》等。199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20周年前后,出了一批专题性的著作。比如,《更生中国——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前前后后》、《1976~1981年的中国》、《沉浮:中国经济改革备忘录》、《交锋:中国当代三次思想解放实录》、《文革前十年的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始末》、《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知青备忘录》等等。现在,每年均有上百篇当代史论文发表,国内数十所高校开设了当代史的课程或者讲座。

第三,翻译出版了一些西方学者的当代史著作。比如,《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文化大革命的起源》、《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人民共和国史》、《中国的大饥荒(1959~1961)》、《中苏关系内幕纪实》、《周恩来与他的世纪》、《美国对中国的反应》、《江青全传》等。其中最有影响的是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和麦克法夸尔所著《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两书。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当代史是目前最有活力、发展最快的研究领域之一。

应当看到,当前已经具备了许多进一步推进当代史研究的前所未有的优越条件。

第一,经历了最近20多年的反思,“左”倾教条主义的观念已经受到了根本性的冲击,不仅证明了《关于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建国以来的许多重大问题的正确评价,而且由于《决议》发表以来的深刻的政治变动和经济转轨,进一步加深了人们对历史规律的体验,提高了人们的理性精神和科学思维能力,引导各阶层群众对当代社会变迁的普遍认识继续前进。这不仅有助于形成适合研究者深入反思的相对宽松的思想政治环境,也有利于造成对当代史著作的巨大的时代需求。

第二,“文革”结束以来,学术界经历了一个痛苦的学术更生期。历史学逐步从“左”倾意识形态工具的困境中挣脱出来,逐步地经受了市场经济的考验,逐步地实现了学术队伍的更新换代,实事求是的学术精神日益恢复和发扬。

第三,随着对外开放和正常的中外文化交流事业的发展,中外学术交流日益频繁,自我封闭的学术机制已经打破。我们已经能够及时了解国外的学术动态,借鉴和吸取西方学者的长处,努力提高自己的研究水平。

第四,随着社会的民主化进程和档案工作逐步走上法制化的道路,一个规范的管理、公开和利用档案的制度正在形成。各级档案馆都在努力改善条

件,提高服务水平,最大限度地变长期保管的死档案为有利于历史研究,有利于经济建设,有利于繁荣文化的活财富。这样,就为研究人员充分利用档案创造了极好的条件。《本埠人米恩图》,(0701-0401)《南平米恩图》背面

第五,随着经济文化建设的加快,政治透明度和社会管理水平的提高,当代历史资料的生产和面世的周期大大缩短,使当代史成为信息资源极为丰富的研究领域。除了档案资料、报刊资料、回忆录、个人文集等基本资料外,目前,正有以下几类资料不断地大量涌现出来:(一)新编志书。上世纪80年代以来,各级政府建立了地方志办公室,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开展编修方志的工作,至今已经取得巨大成就。据报道,截至2002年7月,全国已编辑、出版志书12000多种,其中省、市、县志5000多种,其他志书7000多种。据统计,截至2001年底,江苏省已完成市、县志75部,区志28部,省级专业志71部;累计出版乡镇志520部,省以下专业志1089部,地情书303部。这些志书,有些是在旧志的基础上增修或重修,增加了当代内容;有的在全书中专设当代分卷,有的完全以当代内容成书;(二)各种年鉴资料。上世纪80年代以来,各级政府、部门、行业非常注意编辑出版年鉴,现有年鉴包括地方省、市、县年鉴;部门年鉴,如统计年鉴、教育年鉴、交通年鉴、财政年鉴、税务年鉴、科技年鉴、经济年鉴、农村统计年鉴;学术年鉴,如社会学年鉴、历史学年鉴,等等。据检索,目前仅国家图书馆所收藏的当代年鉴就有5700多种;(三)各种政府公报、白皮书、政府工作报告和官方统计资料。比如,每年各级人代会交付审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两院工作报告;各级党的纪检会议公布的纪委工作报告;定期组织的工业普查资料、农业普查资料、人口普查资料;各种会议资料;各种行业、企业、事业单位的统计资料,等等;(四)政府机关、研究机构和研究人员的研究报告、专题丛书。比如,1996年出版的国务院研究中心报告选《中国发展研究》、中国社科院有关专家上世纪90年代初以来每年发表的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蓝皮书、《中国改革与发展报告》(1999年)、《成长的经验——中国绩优大企业案例研究》、《国有企业:你的路在何方》、《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以及其他中央和地方高校、研究机关、个人编撰出版的类似报告等等;(五)各级机关、部门编辑出版的或编印成册的各种文件、政策、法规汇编资料;(六)国外资料,包括国外政要、名人、专家、学者的回忆、著述;已经开放或出版的档案或其他资料;新闻报道等等;(七)各类民间素材,包括一切保存在企事业单位、部门或散落在民间的书籍、传单、报表、账册、日记、信件、单据、图表、报告、规章、其他文字材料以及一切不见于文字的事实。这一切说明,当代史资料的丰富性是令人难以想象的。

第六,由于学位教育制度的恢复,一批又一批经过严格学术训练的硕士、博士将加入研究队伍,尤其是许多博士生将选择当代史课题作为博士论文选



题,其中将会出现一批有重大学术价值的突破性成果。本刊发表的3篇文章,就是我的3位博士反复分析史料,反复修改提纲,反复修改文稿的结果。

第七,信息技术的革命,大大改善了研究条件。20世纪中期以来,我国的信息革命飞速发展。据统计,截至2001年6月30日,我国约有上网计算机1 002万台,CN下注册域名总数128 362个,其中.GOV.CN为5 181个,WWW.站点数(包括.CN、.COM、.NET、.ORG下的网站)约242 739个。我国国际线路的总容量为3 257M,连接美国、英国、加拿大、德国、法国、日本、韩国等。1999年1月,由中国电信、国家经贸委经济信息中心牵头的“政府上网工程启动大会”在京召开。6月,电子杂志社等单位提出《中国知识基础设施(CNKI)工程规划》(China National Knowledge Infrastructure)。9月,在天津召开的“'99国家信息化论坛”正式提出了《中国知识基础设施(CNKI)工程五年规划》。属于这个规划的知识资源系统包括《期刊全文数据库》、《博士硕士论文数据库》、《报纸数据库》、《重要会议论文数据库》等,目前期刊论文数据库已收集国内5 400多种期刊,900万篇全文文献。博士硕士论文数据库收集国内400多个博士点的2 000多篇论文,报纸数据库包括600多种报纸150多万篇文章,会议论文数据库包括6 000多个协会、学会、研究会每年大约5 000本论文集。信息革命对历史学研究人员有什么意义呢?与外界的联系更快捷,接受外界的信息更灵敏;摆脱了手工书写和修改文稿的重复抄写,实现了无纸化办公和文稿的快速传输;随时可以发表自己的见解,外界也随时能够检阅自己的研究成果;检索文献成了在自己家中或者办公室就能够进行的十分方便的事情;文稿保存更简单,也许毕生手稿只要储存在几张小小的软盘里;研究活动中的一些统计分析可以借助于计算机完成。信息革命带动了历史学研究的革命性变化。上述七个方面的条件,提供了进一步繁荣当代史研究的难得机遇。

为了推动当代史研究,需要在提高研究水平方面下工夫。为此,需要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正确地认识和处理当代史和党史的关系。当代史和党史(当代党史)的关系是一个比较容易弄淆的问题。事实上,建国以后的党史和当代史有重合的地方,学术上它们也有互补性。但是,不能忽视它们之间的重要区别。比如,党史虽然需要以社会变革的宏大场合为分析背景,但是它只能以党的发展历程为叙事框架,而当代史则必须完整地再现当代生活的全貌;比如,党史研究当然也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但是党的活动与当代政治生活有密切的联系,因此党史研究就不能不具有比较强的时政性,而当代史研究则应当与现实生活的某种要求保持一定距离,力求避免时政性;比如,党史也包含或者涉及全党包括人民群众的丰富实践,但是党史研究常常把大量的人力物力投在党的领袖人物的研究上,而当代史研究则必须时刻注意避免以

领袖人物的研究代替对历史的完整解释，等等。多年来，经过广大党史研究人员的努力，党史研究的科学性日益加强，但是，无论党史研究还是当代史研究，都应该继续克服那些受“左”倾教条主义长期毒害养成的陈旧党史意识、泛政治意识和意识形态情结。在当代史研究方面，人们常常不恰当地强调政治性，强调作者存在一个政治立场问题，甚至还有人考虑是否需要在不同场合分别使用意识形态话语和学术话语。这是不太容易让人理解的。在中国，政治和学术的关系从来很难说清楚，当代发生的事情本来无法切断和政治的联系，研究这些事件自然也可能发生一些超出学术范围的影响。假如动不动就和作者的政治立场挂钩，那么，不良后果是显而易见的。那种不遵守历史学的基本规范，把历史研究等同于政治宣传，运用意识形态话语灌输政治说教，以迎合狭隘需要的结论代替科学分析，到处设置禁区，以解释当前政策为出发点的历史功利主义，动辄戴帽子打棍子等等错误态度和方法，与当代史的科学性都是根本不相容的。

第二，培育当代史的科学理念。当代史研究应当把坚持历史学的科学性放在第一位。也许有人会问，这样说会不会导致人们忽视历史唯物主义？研究历史必须坚持历史唯物主义，这是不需要讨论的。现在的问题是，人文社会科学各个领域的人们常常都在异口同声地声明自己坚持了唯物主义。这个现象本身说明，唯物主义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被人们标签化了。历史学的科学性这个论题本身包含唯物主义的思想方法。同时，我们丝毫不能得出这样的结论，似乎只要我们宣称掌握了唯物主义，肯定就会获得科学的成就。就历史学而言，它的基本规范、基本理念、基本方法在它的所有领域都是不能违背的。对于研究人员来说，属于认识论和历史观的唯物主义，与历史学的学术观念和方法，并非可以互相代替的关系。许多事实告诉我们，有唯物主义并非一定就能正确说明历史，大家都有唯物主义思想并非一定没有分歧，看法错了并非一定由于唯心主义作祟；不熟悉不信仰甚至反对唯物主义的学者并非绝对写不出好的史学著作，例如某些西方历史学家。标签化、程式化的思想方法与科学性是根本对立的，当代史研究必须坚持以挖掘史料为要义，以探询历史真实为宗旨，以弄清事实真相基础上的总结经验为原则。

第三，建立开放的学术环境。当代史研究应当是一个开放的学术系统。它的开放性体现在哪些地方呢？在心态、学术方法、资料的开放性以及学术成果的交流、不同观点的争论等方面。我们应该保持一种开放的心态。对当代历史的探讨有利于冷静地回顾走过的道路，总结经验教训，避免失误。不要人为地划定禁区，当代史的许多课题在国外，尤其在美国和欧洲已经成为热点甚至显学，而我们却着力不多甚至还有顾忌。这不仅不利于弄清事实，也很难与他们对话和交流，很难改变学术上的落后状况。在研究课题方面应当尽可能消除空白，改变目前仍然存在的研究领袖人物多，研究非领袖人物



少；研究当红人物多，研究过时人物少；研究成就多，研究挫折少；研究林彪、“四人帮”的罪行多，研究他们步步上升的原因少；研究政治运动多，研究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少；研究社会上层多，研究普通群众少；研究国内情况多，研究国际因素少等等不平衡的状况。要提倡把人文社会科学的多种方法融合起来，在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同时，吸取和借鉴其他学科的理论方法。有许多课题，甚至可以集合历史学、文化学、人类学、社会学、文学、哲学等方面的专家共同来做。这方面，西方学者比我们做得好一些。最近看到的《中国乡村，社会主义国家》一书，是西方学者研究中国农村的最新成果之一，上世纪90年代初在美国一出版，立即获得好评。该书的3位作者，分别是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政治学教授、加利福尼亚大学历史学教授、纽约州立大学社会学教授。多学科的合作，显然有利于形成本书丰富的知识框架。我们提倡充分掌握史料，也注意到档案的日趋开放，但是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有些资料的开放性和各种资料的资源共享还很不够。应该考虑编辑出版一套完整系统的大型当代史资料集，为更多的研究者提供条件，推动更多的人参加讨论。应当更经常地开展中外学术交流，鼓励不同观点之间的热烈争论，使当代史真正成为一个不同意见随时可以平等讨论的开放的学术领域。

第四，关注重大问题和实际生活的新鲜素材。应该承认当代史与当前生活有密切联系，严格说来当代史的凝固性确实不够，因此当代史的著作有它的不稳定性。从史学著作对历史实际的肯定性方面看，这种不稳定性是一种缺陷。我们必须注意在收集史料、考订事实方面下更多的工夫，以便尽量提高准确性，但是这个缺陷是无法避免的。从另一个意义上看，当代史研究的这种不稳定又包含某些有价值的东西，即当代人对自身经历的直接看法。通过当代史总结出来的这些看法，是一种宝贵的经验，是最容易为当代人接受的匡正生活的参照系，也是后人评价我们这个时代的重要指标之一。当代史上的许多重大问题，是这个时代的重要特征，是社会普遍心理的聚焦，是观察历史规律的有利视点。必须花力气在当代诸多重大问题上取得扎实的研究成果。也许，今天想写出一部真正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当代通史（1949年至今）还很不容易，但是在某些重大问题上取得一些突破则完全是可能的。由于当代史具有与当前生活的连贯性，因此，生活形态化的资料就特别丰富。20世纪80年代，许多老同志曾经大力呼吁抢救活材料，这些活材料当时还是指老同志们的回忆。我这里所讲活材料不仅指回忆，而是实际生活中千姿百态的大小插曲、苗头、事迹，包括当事者的记忆以及有可能被湮没的文字材料和遗物。它们具有历史多样性、本色性、不可复原性的特点。举一个很有意思的例子。大约1969年前后，在我的家乡小镇的旁边，有一个大队（即现在的村），实行全大队统一核算，也就是改变生产队分配为大队统一分配。这

是一种平均主义的穷过渡。大队党支部规定，各生产队所有财产，包括房屋、耕牛、农具、储备粮、集体的猪和羊以及田里的庄稼，一律不许动，都作为大队的收入参加分配。经济条件好的生产队的农民不愿意，许多人一边干活一边哭。这个事例如果没有人记录下来，也许若干年后再也没有人知道。它反映了农民对平均主义的抵制，代表着广大农民的生活的底色。把它放在文革时期的极“左”背景下，便会更多一些历史的解说。当代史研究应该大力提倡做田野调查的工作，最大限度地利用、挖掘活材料，最大限度地弥补文本材料的不足，最大限度地把当代史的动态性揭示出来。

中国当代史是中国人的当代发展史，是一门关于中国的学问。今后，将会有更多的外国学者来研究它，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也将更多地走向世界。所以，中国当代史必将是世界学术关于中国的学问。

所有中国学者，都要为这一点而努力。

(原载《社会科学研究》2002年第5期)

建国初期江苏的工商业调整

陈肖静

建国初期我党对私营工商业的政策与前苏联十月革命以后苏维埃政权所采取的政策不同，不是将大、中、小型企业收归国有，而是合理调整工商业，使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营经济在国营经济的领导下得到恢复与发展。

近20年来，学界对建国初期工商业调整的研究成果主要反映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1949～1966）》（赵德馨主编，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董辅初著，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等著作中，这些著作通常偏重于研究全国的工商业调整，对各省、市工商业调整的研究几乎空白；研究成果中定性研究多，定量研究少。本文力图克服“泛区域”研究的局限，将研究视角下移，研究江苏这一行政区域的工商业调整，并通过实证与定量分析的方法对江苏调整工商业的政策、措施与成效进行探究。

伴随着江苏^①全境的解放，苏北、苏南行政公署和南京市人民政府先后诞生。在行政体制上，苏北行政公署辖扬州、泰州、南通、盐城、淮阴5个专区。苏南行政公署辖无锡市和镇江、常州、苏州、松江4个专区。

1950年3月，江苏实行了财政经济工作的统一管理，稳定了物价，制止了恶性通货膨胀，财政经济状况逐步好转，国营经济在市场上的领导地位逐步确立。但是私营工商业却出现了另外一种情况。由于物价普遍下降，虚假购买力突然消失，工商业机构臃肿、经营不善等弱点完全暴露，市场上出现了重要消费品如粮食、棉纱、棉布等供过于求的现象，这就使过去在通货膨

① 现在的江苏省，在建国初期包括南京市、苏北、苏南3个行政区。其中苏北行政公署成立于1949年4月，苏南行政公署和南京市人民政府成立于同年5月。1950年4月，苏北行政公署、苏南行政公署分别改名为江苏省苏北人民行政公署、江苏省苏南人民行政公署。1953年元旦，江苏省人民政府正式成立。本文论述时间为1953年之前，为表述方便，将南京市、苏北、苏南统称江苏。

胀中发展起来的一些私营银行和私营商行纷纷停歇或倒闭，许多习惯于投机倒把、囤积居奇的私营工厂因存货过多、负债累累，停工减产。具体表现在：

工厂大幅减产、停工，工厂、商店闭歇业陡增。江苏财经统一后，物价渐趋稳定。但1950年春，南京经济出现了市场萧条、商品滞销、积压严重的现象。对此，许多私营企业消极经营，有的转移财产，抽逃资金；有的解雇职工，关厂歇店。1950年1~6月份，南京市私营工厂停业88户。私营商店开业1000户，闭业1444户。闭业户超过开业户444户。^{[1](P13)}苏南区1950年3~5月商店倒闭4516户。^[2]苏北地区由于资金短缺，市场供过于求，商品销售困难，工厂大幅减产、停工，工厂、商店纷纷倒闭。据南通、扬州、泰州等31个城市统计，1950年1~5月油米、磨面、针织、棉织、卷烟、肥皂等业，停工有650家之多。^[3]据苏北南通、泰州、淮阴、盐城四区15个城市统计，1950年3~5月份，工厂关闭886家，商店倒闭2271家。其中不适合社会经济要求及依靠投机维持生存的行业，如迷信品制造、银钱等业所占比重较大。^[4]生产的萎缩，导致工人大批失业，劳资关系紧张。南京市失业半失业工人达5.2万人。^[5]据苏北总工会不完全统计，苏北失业半失业工人约有9万余人，占职工总数的25.7%，灾荒地区情形更为严重。^[3]

私营工商业的困难，造成了两种错误认识。一种是，部分工商业者归咎于人民政府。要求恢复通货膨胀，回到旧中国经济秩序的老路上去；另一种是，党内少数同志产生了急躁冒进的苗头，主张趁私营工商业发生困难的时机，一举消灭资本主义。党中央和人民政府从实际情况出发，否定了上述错误意见，提出了调整工商业的战略决策。

针对一些干部中存在的想挤垮私营工商业的不正确思想和做法，毛泽东在1950年4月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明确指出，“维持了私营工商业，第一维持了生产；第二维持了工人；第三工人还可以得些福利。当然中间也给资本家一定的利润。”^{[6](P98-99)}同时，毛泽东还在全国统一战线工作会议工商组讨论会的一份发言记录稿的批示中强调：“应当限制和排挤的是那些不利于国计民生的工商业，即投机商业、奢侈品和迷信品工商业，而不是正当的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工商业，对这些工商业，当它们困难时应给予扶助使之发展。”^{[7](P214)}毛泽东的这一批示明确了工商业调整的方向。

1950年6月6日在北京召开了中国共产党七届三中全会，毛泽东在《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的报告中指出：“在统筹兼顾的方针下，逐步地消灭经济中的盲目性和无政府状态，合理地调整工商业，切实